

大转型

——中国治理变革研究

沈传亮◎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014034821

D63
274

大转型

——中国治理变革研究

沈传亮 著



D63
274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151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转型——中国治理变革研究/沈传亮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202-07951-5

I. ①大… II. ①沈… III. ①行政管理-政治体制改
革-研究-中国 IV. ①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1589 号

书 名	大转型——中国治理变革研究
著 者	沈传亮

选题策划	王 静
责任编辑	王 岚
美术编辑	吴书平
封面设计	赫 江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14.75
-----	-------

字 数	210 000
-----	---------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978-7-202-07951-5/G·3511
-----	-------------------------------

定 价	35.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此时，处于强弩之末的“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中国内乱不止、困难重重，发展方向不明。在历史关键时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顶住巨大压力，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支持配合下，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果断进行隔离审查，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的继续发展、扭转困局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大事件发生短短两年后，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的治理观念，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迈出了中国治理转型的脚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型治理理念，短短几十年内中国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发展迅猛，创造了30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神话，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201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50万亿人民币，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二的位置。生活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经历了从温饱还成问题到实现小康的重大转变，目前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阔步迈进。2008年举办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为“无与伦比”，2010年举办的世博会被评价为“无比精彩”。在其他领域，中国同样也取得了非凡成就。这些成就，就是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堪称奇迹。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人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即《中国奇迹》，其前瞻性令人敬佩。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发展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看看世界上持续多年的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就能够反映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掀起了多大波澜。

中国为何能够在短短三十多年里取得如此成就，引起不少人的讨论和分析。从国际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年过百岁之际与王宁合

著的《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一书，认为中国选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来自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则认为中国治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治理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傅高义以十年之功写就的《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12 年版），认为中国发展成功离不开邓小平这位“总经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 2011 年的新著里就中国共产党的收缩与调试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共执政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在八十岁高龄出版了厚厚的一本《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从国际大变革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发展历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也出版了《当中国购买世界》（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英文版），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发展的奇迹。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近几年也撰写多本著作就此展开分析。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则认为中国获得的巨大成就与地方竞争有密切关系（《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

从国内看，华生著《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东方出版社 2012 年版）认为，中国发展靠四轮驱动，一是，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二是，坚定而又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对抗；三是，基于既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和土地供给；四是，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张维迎著《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认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中国的繁荣。周其仁等著《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从产权明晰角度就此予以分析。王绍光认为中国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中国政府的汲取能力也很强。何增科领衔撰写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从政治发展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俞可平主编《中国治理变迁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则对中国发展从治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著名党史专家谢春涛主编的《中国共产

党如何治理国家?》(新世界出版社 2012 年版)对此进行了多方面解释和解密。还有研究者如潘维等从中国模式的角度进行解读。

上述著作是解读中国发展秘密众多论著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少论著从某些角度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大发展、大变革、大变动是个全局性的深层变动,其背后是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进行了国家转型,并不是某些问题的单独解决或某一领域的独自变革所带来的。解读中国这些年的成就必须从更宽广的视角和以更深入的分析来寻求中国发展的答案。

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进程中,这一转型从 1840 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1840 年后的第一个 100 年,中国不少志士仁人为推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殚精竭虑。但碍于古代中国依然惯性十足、国际列强肆意干扰了中国的自发转型等因素,这 100 年中国国家转型未有质的变化,帝制虽废,专制如故、列强仍在。1840 年后的第二个 100 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国家转型迈出了实质性步伐。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难征程。毛泽东时代,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探索进程中出现重大曲折,没有完成推动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所谓从古代向现代的国家转型就是向着开放国家、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等多维度变革。邓小平认为中国转型目的是“跟上时代”。中国 30 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向世界展示出一幅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全方位转型的图景。在求真务实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或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并推动了中国在世界局势大变动情况下的全面转型。

这一大转型的具体表现是中共治国、治党的方式顺应时势出现重大转变。中国国家转型通过中共治理国家和政党的方式转型所展现。而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离不开中国治理方式的转型,这一转型正由中国由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引起。

本书试图从治理转型的视角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原因。正文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中国治理转型的缘起和转型的启动;第二章分析中国如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了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章分析中国如何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第四章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积极推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第五章分析为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中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第六章分析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如何逐渐明确定位，逐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自觉转变。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从人治到法治、从粗放到集约、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五大转型是当代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今后中国能否一路凯歌，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取决于这五大转型的转型力度和变革方向。当然，中国转型还远未到位，有的方面才刚刚踏上转型之路，有的则还未迈出实质性步伐，所以本书以“未竟的转型”作为结语，对中国转型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作一简要展望。

本书采取史论结合的写作方式，对30多年来中国国家转型的若干关键环节和重大变革进行分析，在梳理中国治理转型进程基础上对转型的成就进行初步总结，对继续转型存在的难题进行解读，对中国转型的未来进行展望。撰写本书的重要目的就是从中国转型的视角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展示中国治理转型的历史进程。也希望通过此书，让关心中国发展的朋友，既了解中国转型的苦难辉煌，也对中国面临的挑战有清醒认识，更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治理转型的启动·····	(1)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为中国治理转型带来契机 ·····	(1)
二、为开启转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了充分准备的 中央工作会议·····	(10)
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的 伟大转折，成功开启了中国治理转型的大门·····	(28)
四、实现历史转折开启中国治理转型的归因·····	(32)
第二章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40)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 调节为辅（1978年至1984年）·····	(40)
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1984年至1988年）·····	(48)
三、新一轮争论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标的确立（1989年至1992年）·····	(54)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搭建及其实施（1993年至 2003年）·····	(63)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2003年至今）·····	(67)
第三章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	(71)
一、对外开放的大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徐徐打开·····	(71)
二、中美建交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视界·····	(76)
三、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	(80)

四、从开放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到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对外开放 迈出大步·····	(84)
五、“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标志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变革 ·····	(88)
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91)
七、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开启全新开放时代·····	(96)
八、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	(101)
第四章 从“人治”向“法治”迈进·····	(105)
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	(105)
二、立法工作的初步展开与“两案”审理·····	(108)
三、1982 年宪法的制定与普法、“双打”等工作的开展·····	(113)
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与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及实施 ·····	(119)
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形成·····	(123)
六、1982 年宪法的四次修改·····	(127)
七、建设法治政府的历史进程·····	(131)
第五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难推进·····	(136)
一、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走一条经济发展的 新路子·····	(136)
二、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 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	(147)
三、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期间，党和国家推动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努力·····	(155)

四、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动员 与部署·····	(166)
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难题与对策·····	(170)
第六章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深刻转变·····	(174)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理念转型·····	(174)
二、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176)
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的规范化·····	(184)
四、央地关系的合理化·····	(188)
五、党的决策体制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	(193)
六、党内民主的发展·····	(196)
七、干部选任体制机制变革·····	(205)
结语 未竟的转型·····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26)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中国治理转型的启动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中国告别全能体制，启动治理转型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启动治理转型必然遇到传统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的阻碍和羁绊，历经磨难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破了传统治理理念的意识形态金身，为启动治理转型提供了思想准备。随着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和冤假错案的初步平反，中国治理转型有了更多的人才储备和组织保证。尤其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为启动中国治理转型的关键节点。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为中国治理转型带来契机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党中央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对被“四人帮”压抑的党内健康力量和渴望稳定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尚未复出的邓小平10月7日得知消息后，10日向党中央写信说：“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一次宴会上连喝20多杯茅台，创下自己喝酒历史之最，李先念同志则饶有兴致地拿出笔来记录下了这一高兴瞬间。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10月21日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老百姓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喜悦之情。

但神州大地饱经多年运动，备受摧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一些数据可以表明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生活面貌：全国人均粮食1952年为395斤，1960年下降到215斤，1976年仅为381斤^①。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78年下降到1%。1978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千分之八。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1978年新华社记者到安徽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辛酸：凤阳县某生产五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三只缺口碗^②。

（一）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发展生产

面临如此困局，怎么办呢？多数老百姓迫切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尽快摆脱这种吃不饱、穿不暖的局面，人心思定、思变，很多共产党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胡耀邦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还让捎话给叶剑英和华国锋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文化大革命”结束第10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打电话给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征求今后工作意见，陈云说：“一是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二是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三是对天安门事件要重新审查。”^③这时，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中央领导层在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力图把过去的损失尽快弥补过来。

一是党中央先后下发三批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的材料，

①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②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③ 张树军：《中国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运动，同时在全国各地清查其帮派体系。到1978年，“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全国性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经过这一群众运动，整顿了全国各级领导班子，纯洁了党的组织，有利于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是开始部分进行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恢复无辜受迫害干部等工作。1977年3月复出的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力量写了一篇《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0月7日即“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周年之际，这篇经过17次修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此文一出震惊全国，《人民日报》短期内收到的来信和来电可以装满两麻袋。这种现象反映了平反冤假错案顺民意得民心。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赴任时中组部前院鞭炮齐鸣。上任后，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大刀阔斧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和分配老干部工作。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摘掉50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78年7月，按政策分配和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干部5344名，占中央和国家机关53个单位原有待分配干部的87.2%，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为开好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治理转型准备了健康力量。

三是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就铁路、企业、煤炭、农业等恢复和发展生产做出各项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也得到较快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197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4%；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全国财政收支相抵，结余31亿元，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支大于收的情况。1977年8月，国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3000多万城市职工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但要想从长时间积累的错误治国理政观念中走出来还有很大困难，而一些领导人的错误作法更加重了扭转困局的难度。如有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强调抓纲治国，按照“文化大革命”老一套

通过运动搞经济建设，提出“生产斗争、革命斗争、科学革命”一起抓。在中共十一大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说“隔几年还要再来一次”，这显然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此时经济工作方面由于不顾客观条件，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具体表现就是在没有任何地质材料论证的情况下武断提出“要挽起袖子大干”，“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1980年全国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这在党内虽然得到多数支持，也反映了部分领导同志试图尽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思想，但毕竟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思想方面，“两个凡是”^①的出炉，加重了党内思想僵化，不利于解放思想。如此，既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也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诸多原因，导致中国巨人的前进步履蹒跚。

（二）国难思良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按照“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受到很大阻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老干部也不可能出来工作。“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有老同志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粉碎“四人帮”刚过一个多月，有位中央副主席就在全中国宣传会议上说：“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这个讲话显然不利于邓小平复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叶剑英建议对邓小平的提法好一些。但开会时，有的中央领导给各个小组打招呼说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工作。但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顶住压力在会上提出让邓小平等人快出来工作。陈云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的这一发言是事先写好的，连标点带字一共三百零几个字符。然而会议简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被称为“两个凡是”。

报组却提出或修改或搞摘要。总之要删去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陈云问：为什么要删去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同华主席讲话口径不一致。陈云说，如果要求每个人的讲话都得和领导的口径一致，那好办，只要每期简报都把领导讲话重复一遍就是了。要登我的发言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当天晚上，有的领导人还为此亲自跑到陈云同志家登门拜访，劝他同意简报组的删改。谈了约一小时，陈云同志始终没有吐口。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没有登简报^①。受此延迟，直到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才被恢复职务。

（三）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率先推动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治理转型提供了干部和人才

事情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做起呢？富有远见卓识和战略思维的邓小平，断然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下手。复出之前，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两个凡是”。1977年2月邓小平向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表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给中央写信，表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4月中下旬，对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5月24日上午，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强调了反对“两个凡是”，并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②在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工作。”“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具有很高政治智慧的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鲜明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立即付诸行动。复出后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率先推动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实际行动否定了“两个凡是”。以教育界为例，邓小平在1977年8

^① 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9页。

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教育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从而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教育黑线专政论的“两个估计”。针对“两个估计”的来源——1971年8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他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①。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恢复高考一事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他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接着，邓小平坚决地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参加高考的有570万人，数十万有志青年，圆了大学梦。现在有不少党的中高级干部是77、78级的，被媒体称为77、78政坛现象。邓小平推翻“两个估计”、恢复高考的举动，震动全国，以实际行动打破“两个凡是”，对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起了先导作用。

（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治理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项工作虽有所进展，但因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没有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这个思想束缚打不破，中国便无法成功走出一条新路，更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也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对这种局面，老百姓不满意。“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渐渐受到了全党上下的反对和抵制，集中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副校长最后审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5页。

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就全文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江苏、河南、福建的4家省报同时转载,接着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引起广泛注意,拉开了全国性讨论的序幕,宣告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为什么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呢?因为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可以绕过当时宣传部门的审查。如果送去审查,必然经过主管中央领导的批准,显然是不能发出来的,所以《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用了这样一个办法,在党校内部刊物上发表,就表示经过了胡耀邦同志的审定,而《光明日报》可以顺利地以特约评论员发表。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依然相当顽强,该文观点受到凡是派的严厉责难。就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当天,《人民日报》时任总编辑就受到了某中央理论刊物总编的指责,说政治上很坏很坏。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还说这样的文章是丢刀子、砍旗,并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见到胡耀邦的时候还指责说,政治出问题,第一个负责的是我,第二个负责的就是你,并且多次点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很大压力。关键时刻,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纷纷站出来支持这场讨论,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在经济建设上要量力而行。在党内外享有巨大威望的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支持了这场大讨论,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讲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长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下午,邓小平同胡耀邦